

■ 新作聚焦

李铁《匠户志》： 是工作，是生活，更是一种精神

□ 丛治辰

李铁长久致力于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以长篇小说《锦绣》《匠户志》为代表，可以说已经成绩斐然。这在非常难得，因为工业题材小说具有特殊的难度。工厂、车间，复杂的机械、壮观的高炉，飞转的齿轮、四溅的火花……如果身临其境，很容易被那种金属般的、坚固的、崇高的工业美学震撼。但这是一种直观的、来自空间的震撼，要以诉诸时间的叙事艺术来表达，似乎就乏善可陈。工业生产往往是某种意义的重复性劳作，从中能够生发出什么有悬念、有高潮的故事呢？尤其对于外行读者来说，只看到一个工人和他们身旁的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其中的门道无法理解，就更感觉乏味了。

“匠”：精益求精的工艺是工人的底气与荣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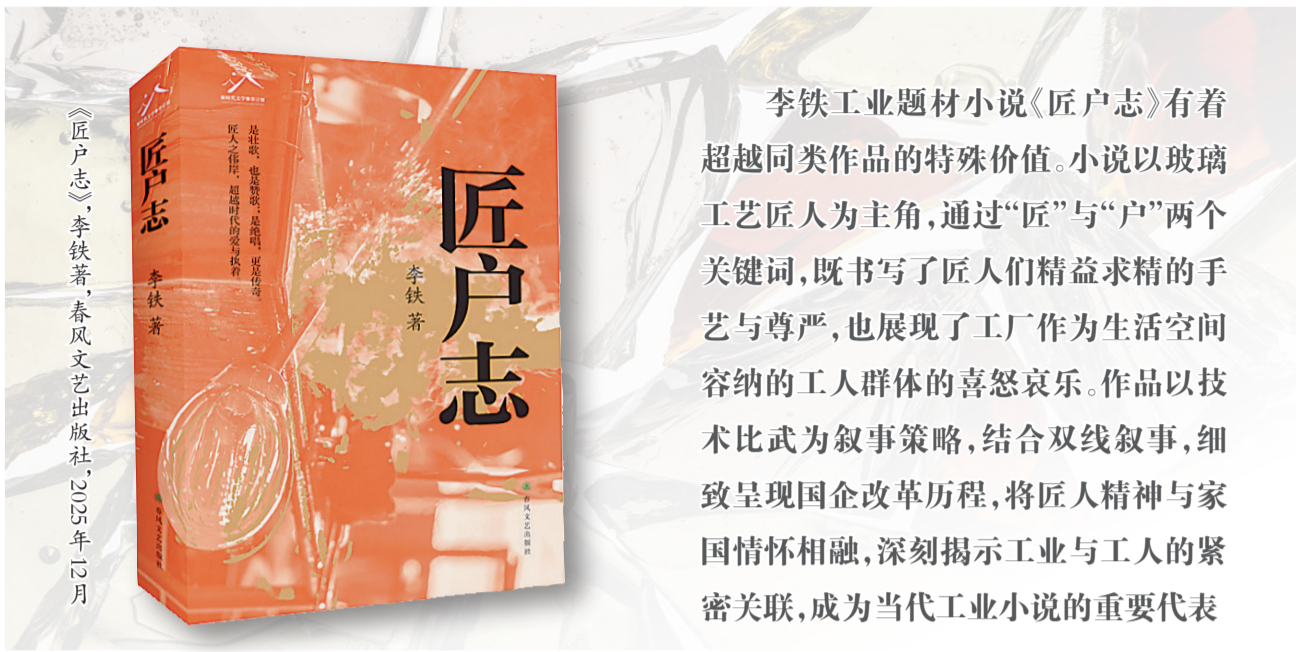
或许正因为此，李铁特意挑选玻璃工艺匠人作为《匠户志》的主要书写对象。玻璃工艺品剔透明艳的美，照亮了过于硬朗的工业生产。但更具有美感的，或许是匠人们生产玻璃工艺品的过程。在并不算长的时间里，仅仅靠着匠人们的手和口，高温下的玻璃就能听话地幻化出种种迷人的形态，生长出种种精细的花纹，冷却固定后呈现出晶莹剔透，甚至如玉如钻石的样子，这不啻是一种奇观。将日复一日的流水线作业转化为奇观化工艺的高光时刻，这就是李铁在文字中制造工业美学震撼体验的叙事策略。但这又不仅是策略，而且是相当一部分事实：对于手艺精益求精的磨炼，的确构成了工人的底气，造就了工人的荣誉感，让他们即便身处窘境，也有足够的自信与骨气，不轻易屈就，更不苛且沉沦。就像小说里“我”的父亲，宁可一家三口挤在局促的斗室里，也不肯低头去恳求厂长。他们视自己的手艺，崇拜工业大拿，也因此互不服气，彼此竞争。由此，李铁又从奇观化的工艺书写发展出《匠户志》中某种堪称结构性的存在：技术比武。

如果不理解那个时代工人们技术的重视，以及与此紧密关联的特殊的尊严感，大概也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这部小说中有那么多次比武。而且，有些比武不是也太儿戏了？古塔厂和凌西厂同为东北重要的玻璃工艺品厂，通过比武决出技术高下，是关乎各自声誉的大事。在市场经济时代，或许直接影响到订单和效益。这样性质的比武，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可红星厂仅有的三间库房分给谁家居住，居然也是通过比武决定——当然，比武的确好看，“我”的父亲蒙上眼睛也能用手锤精准铆接铅笔头的绝活儿，真是神乎其技，那种风采气度有如傲立华山之巅的盖世大侠。小说中屡屡提及武侠小说。全书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场比武，被“我”比喻为决战紫禁之巅，可见李铁是有意以“比武”的结构，制造一种武侠小说般的阅读快感。但是，职工住房分配不应该有更科学更复杂的办法吗？仅看手艺高下真的公平吗？工人的生产技术固然是重要的，但它作为衡量一切事情的唯一标准，是不是太粗暴和武断了？

事实上，小说中第一次比武，恐怕让今天的读者更加难以接受。古塔厂的骆秋生和凌西厂的欧阳铁同时爱上了吹花女工赵曼。感情的事本是私事，但两个厂的宿怨让厂领导都介入进来，强行要求以技术比武来决定赵曼的归属，似乎赵曼究竟属意谁，根本不重要。尽管行政命令并未完全桎梏个人的情感诉求，赵曼终于还是甩掉欧阳铁，和骆秋生走在一起。但二人后来因骆秋生过分沉迷于技术提高而怅然分手，似乎更印证了工厂逻辑、工人思维深刻的影响力。李铁将此次作为小说开篇最引人注目的情节，显然是刻意强调，那时候工厂的力量的，确可以深入到家庭生活和个人情感。这就涉及这部小说除“匠”之外的另外一个关键词：“户”。

“户”：容纳工人群体生活的喜怒哀乐

“匠”是手艺，是技术，是工作；“户”是门户，是家庭，是生活。“匠”可以是个体，而“户”一定是群体，这群体不仅是“匠”的群体，也包含“匠”的家人、朋友、社会关系与生活结构。小说由宋体字、楷体字区分出两个叙事板块。宋体部分以第三



人称叙事，主要围绕骆秋生技艺提升和个人成长、骆秋生与赵曼的相爱相离、古塔厂的兴衰变迁、国有工厂与民营企业的此消彼长展开；而楷体部分则以第一人称叙事，从宋体部分的主线蔓延开去，涉及不同工厂、不同工种的工人群像，更深入到工人们的家庭中去。这样的书写方式，这样的广度与深度，或许是《匠户志》较之其他工业题材小说尤为突出的创新之处。过去的国有大厂不只是生产单位，还为工人提供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一系列保障，工厂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态。工人不只会去工厂上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工厂有关。我们必须理解这样一种客观的关系，才能理解为什么工人对自己的厂、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技术有那样深入骨髓的认同与热爱。“我”的父亲曾跟“我”抱怨企业改革之后的变化：“这样搞下来，厂里的气氛立马不一样了……以前在车间干活儿有娱乐性，工作也是娱乐，大家一边干活儿一边讲笑话，嘻嘻哈哈的没完没了。”这话乍听不很靠谱：车间是生产重地，一边嘻嘻哈哈一边搞工业生产，这还能行？在改革文学盛行的年代，人们对国有工厂中这种涣散的纪律性可谓痛心疾首，深感科学管理的必要性。但如果我们认识到了工厂与工人全方位的关系，或许可以换个角度理解父亲对往昔的怀念——要知道，“我”的父亲是钳工大拿，可不是《乔厂长上任记》里杜兵那样吊儿郎当的工人——既然工厂不仅是工作的地方，也是生活的地方，那么车间就不仅是生产空间，也可以是娱乐空间。父亲所说的那些工人，并不觉得自己在从事枯燥而高强度的劳作，而是在过一种能够容纳他们喜怒哀乐的生活。

当然，出于对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的合理焦虑，这样的生活必然要发生改变。《匠户志》还有一个重要价值，就是以国有工厂和产业工人为焦点，细致地写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不过具体到国有工厂，尤其是东北的国有工厂，近年来的文学书写往往会无意无意地触及一个带有反思性的议题：国企改革中的“阵痛”。骆秋生这样一个技术工人出身，后来因为替广大工人说话而阴差阳错地成为企业管理者的形象，不能不让人想起曹征路《那儿》中的小舅——骆秋生恰恰也是叙述者“我”的小舅。如果李铁在塑造这个人物时确实受到了《那儿》的影响，骆秋生这一形象的突出价值恰恰在于以小舅所没有的机遇，提供了《那儿》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李铁没有一味地站在工人的角度表达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不满，尽管他也客观地反映了类似的现象。他以更加务实的想象力和思考力，让骆秋生做到了《那儿》中那个小舅竭尽全力也未能做到的事，那就是在改革过程中因势利导地实现了集体控股而非个人控股的股份制改革，从而使古塔厂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再一次辉煌。尽管这一辉煌终因所有制问题中断，骆秋生阴差阳错入狱五年，古塔

厂竟被马氏集团收购。但李铁似乎是有意识利用这次挫折，进而探讨又一种可能性：即便民营资本收购了国有资产，是否仍可以在雄厚资本和现代管理的支撑下，延续前一个时代的梦想与传统，更好地利用国有工厂长达30余年的积累？——那不仅仅是资产的积累，更是技术的积累，也是一种精神的积累。

“匠”的精神气象与“户”的家国情怀

古塔厂在改革开放年代屡经周折，但又两度走向辉煌，究其原因，仍源自过去那种生产与生活和谐相融的日子里淬炼出来的匠人追求与匠人品格。骆秋生的公心、赵曼的执着，皆因他们出自“匠户”，认同“匠”的精神。这种精神包含勤力开拓的坚韧、对工业技术的信仰、对集体的认同，更包含着身为国家主人的荣誉感。因此，《匠户志》结尾处将骆秋生和欧阳铁对决的意义上升为民族工艺的尊严之战，丝毫不让人感到矫情。尽管在小说很长的篇幅里并未涉及民族国家的宏大话题，而似乎多在家长里短的小事里纠缠，但是共和国“匠户”的生活本身，就始终与集体、家国紧密相连。工厂的逻辑渗透进日常生活，国家的认同与文化的认知也就渗透进了日常生活。就此而言，品行卑劣的欧阳铁的失败其实是注定的。尽管他对于技术的追求达到了一种无国界的偏执，但他恰因为这样所谓的“开放”心态而丧失了原则，混淆了大是大非。在中国传统中，对于“术”的过分沉迷从来无法让人臻于完善；只有达到“道”的境界，“术”的水准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超越性提升。这种“道”不仅包含着对“术”的信仰，也包含一个人的心胸、品格和道德境界。骆秋生最终绝处逢生，将道家智慧融入玻璃工艺，于炫目的灯光下闭上双眼打开更为灵敏的其他感知，堪称神来之笔。在此，李铁是将古老的智慧化入现代工艺，从而拓展了“匠”的精神气象，让小说的家国情怀有了更加厚实的历史与文化支撑。

以此而论，李铁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他写的是工业，却又不限于写工业；他写的是生活，是能够锻造出特殊的生活。他真正深刻地理解和表达了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揭示出工厂对工人深入骨髓的影响力，以及工人对工厂、对工业、对技术的刻骨铭心的认同，并由此发掘出“匠”的精神。这种精神，甚至工业题材写作，可以说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此前的同类写作，让《匠户志》毋庸置疑地成为当代工业小说不可忽视的一块里程碑。（作者系辽宁大学特聘评论家）

■ 创作谈

我是在一个东北城市的胡同里长大的。胡同里一个院子挨一个院子。我家所在的那个院子有六户人家，四户是工人家庭。另外两户有一户是我家，我父亲是医生，尽管我后来当了工人，可我家还是算不上工人家庭。还有一户户主是厨师。比邻院子的情况也差不多，大多以工人家庭为主。在这样的环境里，不是工人家庭的家庭就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从父亲对那些工人师傅的态度上，我得出如上结论。当然这是现在的人不好理解的。父亲说，他们都是能人。我知道父亲是有感而发，工人群体里的人大多心灵巧，让我们大伤脑筋怎么也修不好的东西，到他们那儿往往是手到擒来，生活中许多细节里都有他们耀眼的手艺。

我从小就仰视他们，他们的手艺在我心目中有着无法替代的地位。后来从事写作，想写一写他们的念头总是不可以遏止。我写过许多有关他们的手艺的中短篇小说，比如《乔师傅的手艺》《手工》等，可总觉得不过瘾、没写透，于是，想写一部手艺与手艺人家庭的长篇小说的念头就高高地升起来了。小时候周围的那些手艺人人家如烟云一般浮现在眼前。

怎么入手呢？最先清晰起来的还是窗户外面的“吹花”。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我家附近的一条叫南街的小街有一家玻璃工艺品厂，是二轻系统的。我和小伙伴们常趴在临街的窗户朝里看工人们吹玻璃花。一柱火苗、一根吹管、一个能变各种形状的玻璃体，极具观赏性。我心头一动，决定把主人公路秋生就安排在这里。接下来的文字就随着不断变换的玻璃的形状自然流淌，花开花落了。我本人曾在一家发电厂工作过20年，太熟悉工厂里的工人师傅们了，他们中间藏龙卧虎。当年工厂里技术比武是常事，有时候比起来，真有武侠小说的味道。闭上眼睛，当年那些师傅们的形象历历在目，他们既粗犷豪放，又心细如发，技术上一根头发丝般的差距都不放过。测量工件的尺子测的不是厘米毫米而是道，一毫米等于一百道，稍不小心一锉刀或一车刀下去，那就不是道的问题了。

手艺学好了，一用来工作，二用来展示。这两者看起来没用，实则却相辅相成，没有二，也就没有一。展示是用比武的形式完成的，每个人都想成为那个胜利者，于是就形成了竞争，学手艺的动力就来自于此。这些都成了我的素材。

手艺再高的工匠也是普通人，普通人历经的烟火生活和历史变迁他们都经历了。他们是末日英雄，当机器取代了手工，这些引以为豪的、自视为身家性命的手艺无用武之地时，那种惶惑、恐惧和无所适从是可以想象的。就像电影《海上钢琴师》那位船上的钢琴师走上陆地，那种无所适从感是一样的。小说里的父亲和罗永贵用自己的手工去挑战数控机床。他们去了一个厂，又去了一个厂，不甘心失败，就像挑战风车的堂吉珂德。但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从理论上讲，任何工艺复杂的手工都会被机器取代。这是一个悲壮的过程。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到来，他们必须重新出发，适应日新月异的新时代。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他们的使命。

在这部小说里，我想写更多的工匠家庭，也想写更多的工人的手艺，涉及工厂里常见的车钳刨电焊，也有玉器、针灸，甚至还有写作等与手艺有关的诸多行业的诸多手艺人。当然，小说是写人的。在小说里，无论是骆秋生还是赵曼、阿伟、罗永贵等，都在时代的洪流中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我用心写了他们的失落、彷徨，也写了他们的善良和坚韧，写了他们的命运机遇，也写了幽微人性。结构上采用了复线叙述，主线是第三人称，副线是第一人称，第一人称是对第三人称的补充与解构。

工业题材的审美化是我在写作中追求的目标。其实在实际的写作中，我几乎是意识不到题材的存在的，我的整个注意力都在人上，在他们的喜怒哀乐上，笔锋也一直随着他们的命运起伏。我自觉地站在弱者一边，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在他们庸常的生活中找寻不同寻常的闪光点。这个闪光点如果是一道闪电，就有可能引来一场令人震撼的暴风雨。我一直对生产过程有着不厌其烦的兴趣，我努力将其审美化，尽量使其与小说本身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为我所熟悉的那一户户匠人家作传，我乐此不疲。

怎样让玻璃盛开出花朵

□ 李铁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LITERATURE SUMMIT PLAN FOR A NEW ERA

■ 短评

光影交织 诗画交融

——读卢文丽的诗集《劳作与花开》

□ 李永涛

“西湖诗人”卢文丽的诗集《劳作与花开》按“立春”“谷雨”“芒种”“白露”“大雪”五个农历节气编排章节，撷聚成年轮式叙事结构。以西湖和东阳表征浙江文脉的两大支点，从童年记忆至成长岁月，进而延展至历史文化腹地与个体记忆深处，从中打捞横跨古今、熠熠千年的诗文名家的古典踪迹与书写意象。

《劳作与花开》由一组组诗歌意象织就而成，“玫瑰”“玉兰”“迟桂”“含笑树”“雪果”“无患子树”等植物意象，莫不生机勃勃，葱茏蓊郁；“灰鸽子”“小鸡”啼鸣悦耳，“鲟鱼”锦鳞翔集；“灶膛”“稻草人”“江南的犁”“铁锹”等乡村与农耕意象，不仅跃然纸上，且萦绕着温馨素朴的泥土气息。此外，卢文丽的诗歌中闪现尤多的是“光”。从火光灯光、日光月光、天光微光，到山光水色、草木光阴、和光同尘，诸种人间烟火气息尽收眼底，朦胧意境浮上心头。正如学者谢冕的评价：她能吧所经历的人生予以浓缩和提炼，她能节制情绪的激荡并予以理性的提升。

光与影在不同诗篇中承载着不同意义。《太阳雨》中“光在雨中碎裂/城市正在暗下去”，以简洁的光影描写，展现出城市明暗交替的张力；《花朵苏醒》借光传递自我觉醒的力量，“这些年如何被自己的影子一路追杀”的追问，直白呈现出主体意识摆脱阴影、逐渐觉醒的过程；《樱花树》则以“当金子般的光芒/将它唤醒”，赋予光催生生命的力量，物象随光影流转，营造诗歌的朦胧意境。《时光之诗》中“湖面眺毛般的波光，暮色渐垂，整个江南渗入一滴淡

墨”，以简洁的画面描写，将光、湖、暮色相融，物与词、光与影交织，既保留了诗歌本身的画面感，又形成其诗歌语体独特的视觉化特色与美学风格；《隐者》中“泉声如诉/溅起暗绿的投影”，则以声衬影，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朦胧质感。

诗集特别注重声画融合，让文字更具感染力。《城南旧影》中“父亲的车铃声/仍在消失的小巷里回响”，简单一句引文，将听觉画面定格，余韵悠长；《三月》里“鸟声渗入黎明松软的泥层”，以朴素的表达将鸟声与黎明结合，既贴合诗歌原意，又凸显声画相融的特点。诗集中的多首作品将多种感官感受相互融合，画面鲜活且意味隽永。《夏日》“晨光浮在杯子口/我喝下它。像喝下一段记忆”，将视觉的晨光与味觉、触觉相融，直白又细腻地传递出诗歌的韵味，彰显出作品的独特质感。

卢文丽以极具沉浸交互意味的文字为全息投影，导演了一场独具浙江特色的宋韵文化展。《劳作与花开》包含“浙派绘画”之经典作品的赋咏，突出神游八荒的多重交互；《富春山居图》中“乘一叶扁舟，纵浪大化/上达天宇，下至龙潭”等诗句，不仅为虚实结合的意象运动，更是气韵衍化的时空律动。谈《劳作与花开》，不仅能体验日常劳作、耕耘幸福生活的和谐美，更能品味到“两山理念”，摹绘“诗画浙里”的生态美，蕴含着美美与共的诗画特质，不失为一张镌刻着杭州城市形象和江南叙事谱系的文化名片。（作者系浙江丽水学院人文学院教师）

■ 关注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樊芸提出建议，将“物业管理”调整为“物业服务”，以彰显业主主体地位。将“管理”置换为“服务”，一词之差，意味着物业企业必须关注业主感受，在专业管理与服务沟通之间找到平衡点，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两天后，她的建议被相关部门采纳。这一创见的原创性，显然不属于“服务”二字本身，而属于提出者樊芸。因为看似只是文字层面的调整，其实是“人”基于责任担当和洞见而提出的系统性革新。从知识产权与公共共建的价值而言，此类具有开创性的建议，理应得到尊重与保护。

如果说樊芸代表的建议是在制度理念上的主动革新，那么作家们在AI领域的探索，也是在文艺创作中的主动创新。作家王刚近日谈及人工智能创作实践，言语间充满探索热情。他表示，已着手运用AI进行短剧创作，身兼编剧、导演与表演者身份，通过构思情节、设置悬念、撰写提示词生成影像片段，并计划持续创作、组接成片。他坦言，早年便有执导影像的心愿，如今AI技术的成熟，让这一夙愿得以实现。其实早在去年，作家姬中宪凭借与DeepSeek共创的作品《团雾与横风》，获得由《十月》杂志主办“县@智”在出发返乡叙事征文大赛终奖首奖，这是较早明确标注人机共创并获得文学奖项的案例。颁奖词很有意思：“作者在AI的镜照下痛下决心，亲力亲为，完成了从素材至上到艺术自律的跨越。作品本身及创作备忘录，共同构成了一份关于创作本质的清醒宣言：技术是工具，个体的生命体验与审美抉择、情感与判断力，只能属于人。”

作家的AI创作实践，与樊芸代表的建言异曲同工。二者均非表层文字或技术工具的微调，而是对既有模式的革新，恰似程序迭代升级。他们的成功，绝非文字机械生成之功，而是源于心系民生的责任担当、敏锐超前的艺术洞察，以及敢想敢为的实践精神。

识字遣词，本是创作者的基本功。从古至今，作家无不借助字典、文献等工具积累词汇、明晰字义。从《说文解字》到《康熙字典》，再到当代辞书，均为创作辅助之用。从未有人因查阅字典而被否定

工具不能代替人的创造

□ 王久辛

原创性，亦无人因参考资料、借助检索工具而丧失创作主体性。当下人工智能功能日益强大，看似无所不能，但其终究无法替代人的生命体验、个性表达与原创冲动。樊芸的建议旨在推动国家治理理念升级，而作家的创新探索，开启的是文艺创作的形态革新。人类文明的进步，正是在这样一点一滴的突破中累积跃升。

工具终究是工具，无法承载思想情感，更不能取代灵感与想象。《中华字海》收字逾八万，远超通用字典，却始终只是查阅工具，无法生成独立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无论技术如何迭代，工具终究不能替代创作者的精神劳动与艺术创造。

前不久，由国内团队创作的AI短剧《波斯复仇记》，在海外平台上线72小时就取得了高额的付费用户总额，刷新了纪录。清明期间，一部AI生成的短片《纸手机》在社交平台火爆。这部短片以纸手机为意象传达对逝去亲人的思念，全程由AI完成画面生成，但创意构思、情感节奏与叙事逻辑均由人类创作者反复打磨，而手绘的纸手机作为剧中唯一真实道具也包含了作者巧思。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引领潮流的并非技术本身，而是驾驭技术的人。30年前，曾有编辑朋友对我说：别写诗了，百年后，中国新诗可能只有一首。20年前，一位编剧同学曾对作家徐贵祥说：还傻写小说啊！赶紧改写电视剧吧？百年后，世界文学史，将以电视剧剧为主来写，小说那时候怕是找不着了。时至今日，歌词、影视佳作迭出，诗歌与小说依旧精品频现，文艺版图愈发开阔。人工智能再度重塑创作生态，发展速度超乎预期。但我们不必盲从“唯有善用AI者方能立足未来”的论断，更应坚守：无论工具何等先进，都无法替代写作者发自灵魂的书写与精神层面的创造。

（作者系诗人、散文作家，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文学原创性 · 笔谈 ·